旧扇记（外二篇）

周有光

自从人类发明了第一把扇子，人类的智慧就驾驭了徐徐的风，这阵阵清风给多少人带来了清爽，也成为了文人墨客手中的雅物珍赏。在中国扇子被赋予了太多的文化色彩与文人案牍的遐想，但是它早已失去了最初存在的意义，珍贵的折扇不再给人带来清凉。

拐棒胡同的一把老竹扇承载着太多记忆的微风，多少个夏夜里，张允和在这清风下进入梦乡。昔日张允和因为体弱，禁不起空调电扇的强风，每个夏夜里不开空调，我扇着这把老竹扇，她依偎在我的身旁。折扇可观赏，竹扇送清凉，尽管这竹扇远远不及折扇美观，但是有了这旧竹扇，给酷日带来了无尽的清凉。

拐棒胡同的老楼整修了，她们（注：指周老家的保姆）要扔掉我很多旧物与冗藏。历史在前进，老物不再被新人看上，我拼命挽救下这些她眼中的破烂，挽救的不是旧物，而是记忆与时光。允和走了，我焚祭给她心爱之物与文稿，残存的物件寄托了我唯一的精神希望。斯人已去，两三旧物润泽心房。

庄子说，寿则辱，人一老精神变得枯竭与悲凉，在她眼里一文不值的旧物，在我眼里都是生命最后的记忆与时光。精力不行了，也记不起太多事，通过这旧物拼接起记忆，用文稿嘱托友人保护好这些旧物与旧藏。

周有光时年111岁自撰书之。

张允和送的手表

张允和已经离开十多年了，她与晓禾、晓平都已去了天堂，留下的只有拐棒胡同的空房，以及饱含记忆的旧物。上帝不会忘记每一个人，活着的终将退化变老，只有物品承载着感情永久地传承下去。

我与允和走过了七十多年的路，饱经了人世的雨雪风霜，举杯齐眉令人无限向往。偶然翻出允和送我的上海手表，睹物思人，物是人非。手表虽小情意好，生命虽止，真情不息。观物思人，感慨万分，偶见三两旧物，足慰吾心矣。

周有光时年111岁。

锡炉记

偶见拐棒胡同旧物，乃是昔日友人相赠三足两耳、禽耳饰之清代小炉，案牍雅器，昔日张允和在世时曾将此炉当作笔筒，八十年代曾在书案之上，后该炉不知所踪，今夏得见，深感欣慰，旧物复归，心甚欢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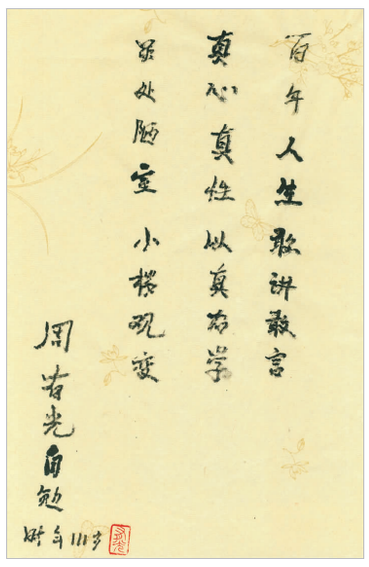
以前初搬入拐棒胡同宿舍，很多昔日的旧藏被张允和收起，也有许多旧物不知所踪。时见三两旧物，回忆起往昔的岁月，感慨万千，作此打油小诗以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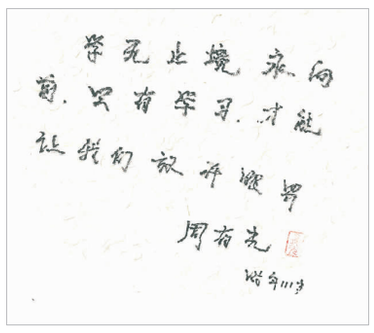
三两旧物忆前缘，锡炉笔筒数百年。
遥想此生无憾事，只叹旧物未重现。
从来古时多余恨，人物岂能得两全。
多情相伴人不老，真心挚情冲云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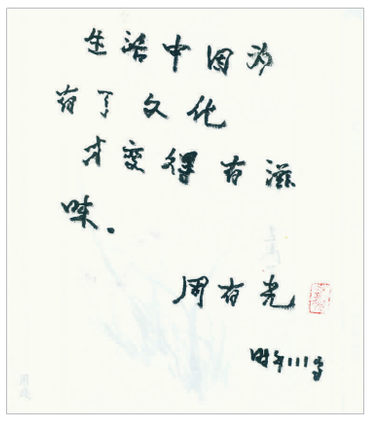
以此自作小诗一首回忆昔日小小锡炉笔筒，并以小记祭之，以为文化人最崇高之敬礼，并借此旧物追忆允和。

岁在丙申年岁末。孙女常回国及老楼探视。自觉精力大不如前，每况愈下，恐老之将至，只得将我生命中最后的思想记忆作此杂记，愿留于后人存而不焚。

丙申年冬月于北京，周有光时年111岁于病中。







时间的痕迹

唐吉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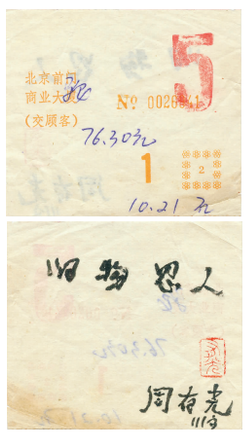
我小心触摸着周有光先生生前这只上海牌手表，虽然它早已停止了转动。手表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张允和在北京前门商业大厦为周老购买的，四十年了，定格的那一分那一秒，不知珍藏了多少温暖的记忆。

周有光先生与张允和相识在苏州，两人差3岁，周老妹妹周俊人是张允和乐益女中的同学，张允和常常串门找周俊人玩儿，时日一久与周先生也相熟了。逢到假期，两家孩子结伴出游，从阊门到虎丘，从虎丘到东山，走过很多路、越过很多河，他们骑车、他们坐船，甚至骑驴。而他们相恋在宝山，张允和1927年、1928年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念书，1928年秋季一个星期天的吴淞江边，蓝蓝的天、甜甜的水、飘飘的人、软软的石头，才子佳人羞答答牵起手，从此欢欢乐乐、风风雨雨七十多年……2002年8月张允和心脏病突发，医生为她抢救时，周老守候在她的身旁，仍然握着她的手，他数着她的脉搏，直到她脆弱的身体失去最后一丝体温。

作为宝山人，我关注着和故乡相关的人与事，周有光、张允和与宝山的邂逅，涌起我内心的波澜，甚至骄傲。很感谢我的朋友老冯，让我读到了周老111岁高龄时写下的这些珍贵稿件。前两年朋友经老作家屠岸——屠老先生近一个月前也仙逝了——介绍认识了周有光先生，屠先生说，“周有光是我的表哥”，这让朋友大为意外。当他拿着屠先生的字条敲开周老家大门时，同样涌起了内心的波澜，可是眼前的老人平易和蔼极了，与他风声雨声读书声无声不闻，家事国事天下事无事不论。自此他成了周老家的常客，进而成为忘年交。周老信任这位比自己小了六十多岁的朋友，正是缘由他的建议，周老断断续续，用颤抖的笔触追忆张允和，于是有了《张允和送的手表》《旧扇记》《锡炉记》……张允和的去世曾给周老带来巨大的精神打击，慢慢地，隔了半年才恢复平稳，他对屠岸说：“人的死亡，是为后来者腾出生存空间，使人类在世界上生生不息。”屠岸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周老这句话，他称自己的表哥是人类第一“通人”，因为他的话勘破了生死的秘密，阐述了宇宙的规律：“他的观点，是在生死观、人生观、宇宙观上对今天我们的最高启示，也是终极关怀。”但读了其手迹中诸如此类的文字：“追忆与允和的过去，回忆起举杯齐眉的日子，满目孤独，满心感伤，无言以对，泪流千行。”我想十多年前周老未必真走出了悲痛，伤口太深太狠，或许他只是在努力捂住伤口而已，他写道：“张允和已经成为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虽已远去，依旧在我心间。”

周老大半生起居平安，遇有大病小灾每每化危为夷，他说那是上帝把他给忘了——谁能想象九十多岁时的这位老者尚能骑着家中破旧的自行车去菜市场买菜。奈何世事白云苍狗，老病到底是欺人的，忽然有一天，周老不认识老冯了，意识变得模糊不清，有时将老冯视为同事，有时视为医生，有时又视为远房亲戚，同时生活不能完全自理。但让人惊讶的是，只要瞥见笔墨，只要笔蘸上墨，他立时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与他说任何一句话都不回应，自顾自伏在临窗的书案上默默地写、不停地写，中了蛊似的，水都不愿喝一口。老人每天精神好、能写字的时间大约两三小时，老冯去时如碰上周老写字，便在一旁静静坐着，不说一句话，待他写完一幅，为他递上一张新纸。偶尔写累了搁下笔望望窗外，融融暖日映在他沧桑的脸上，老冯说他目光冷漠、眼神深邃，像棵临风的古树，“我看得悲欣交集”。

2017年1月14日，周老在度过自己112岁生日的第二天与世长辞，那几天老冯正逢出差，没有赶上见周老最后一面，他觉得很难过。这一晃，风吹过耳，一年转眼就过去了。一次次翻读这几页稿件，一次次体会着这位恂恂然的书生、温温然的长者笔下蕴藉的深情，尽管文词简单，尽管字迹没有张允和的四妹张充和写得优雅，甚至有点漫漶，有点芜杂，还有点唠叨，但有这深情足够了。这深情是痴念，是牵挂，是落寞，这深情更触动我的心灵，使我无法平静。“手表虽小情意好，生命虽止真情不息”——时间终于留下了它的痕迹，这些痕迹足以感动任何一个人，吴淞江的防浪石堤、吴淞江的潮水也一定记得这两位九十年前在这里手牵手的年轻人。



上图为周有光手迹三幅，下图为《旧扇记》等篇中提到的三件旧物及手表发票的正反面。本版图片选自宝山图书馆“缘在吴淞江边——周有光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展”，更多资讯详见“文汇笔会”微信。

南风之薰

再来追赶一下芝诺的乌龟

李荣

古希腊爱利亚学派里，提到巴门尼德，必然会说及芝诺。芝诺这名字或许看着眼生，但是由他提出的那个古希腊的“飞毛腿”阿基里斯赶不上一只缓慢的乌龟的有名悖论，却是知道的人可能更多一点。我始读这个有名的论证是在高中，借着那时的辩证唯物论的政治课，杂读了不少西洋古今的哲学书，好像在一篇课堂小论文里还模仿当时一知半解的一些科学哲学的论著，以芝诺的这一个怪论为例，来发挥从数学物理当中获取哲理的方法。如今当然想不起那时具体胡扯了一些什么，总之不过是一个中学生的胡乱的一时兴起而已。

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的记录，芝诺不只是巴门尼德的一个普通的学生，还被巴氏收为义子，可见他们的关系是很亲近的，用言行录里的话，就是成为巴氏所钟爱的人。柏拉图在他的《巴门尼德篇》里面，还特别地说了一句：芝诺身材修伟，是形貌和学问都十分出色的一位人才。而亚里斯多德的评价，则说他是哲学上和政治上都一样出色——这话对于芝诺一生行事的概括或许更全面一点。

这一位身材修伟的美男子，在政治上却是一位刚烈的勇士，在结局上亦颇惨烈，在此且不赘述。芝诺学问上的作为，如今留存得更多一点。他的思想其实是十分深刻的，可以说是看到了人类思考力的所谓“穷尽处”。但是，头脑太过实际的人们却往往理解不了，甚至把他的不少说法看作“闭上了眼睛乱说”的胡言乱语，因为芝诺说最善跑的阿基里斯永远赶不上一只乌龟，一段有限的距离是永远走不完的，飞着的快箭是不动的。这样的话，多少人会皱着鼻子不屑于去搭理。甚至连一样是古希腊时代著名哲人的亚里斯多德，大概因为他自己那伟大的头脑太过于实际或者说“逻辑”了，对于芝诺的那些说法也是大大地不以为然。虽然亚里斯多德的转述有保存之功，但他每说及一处芝诺，却总是出之以“其推理是错误的、不对的”之类的判语。如今的现代人，头脑更为实际了，更容易指认芝诺的话不过是人类早期的“幼稚”想法，对之轻忽并且自大，哪里还会静下心来认真而且有信仰地好好去想一想呢？

芝诺的这几个说法，其实都是所谓的“悖论”。悖论后面常常藏着值得深思的至理，但人们往往习惯于去反驳它们。芝诺何尝不明白阿基里斯是可以赶上那样缓慢的乌龟的，但是他说，他首先必须到达乌龟出发的地点，这时乌龟会向前走了一段路。于是阿基里斯又必须赶上这段路，而乌龟又会向前走了一段路。他总是愈追愈近，却始终追不上它。后世有多少代的人说了多少的话、写了多少的文字来论证芝诺的话错在哪里。有些论者以似乎“称赞”的口吻说，芝诺其实已经有了一点关乎后世“极限”概念的朴素思想，只是可惜，因为未把时空的全部因素考虑全面而出现了错误。不过，还是有一些诚实而且思考力强盛的论者，坦白地承认如果照着芝诺的想法去想，实在不大容易反驳他，他的问题让人感到棘手。

芝诺与他的老师并且相传是他的义父的巴门尼德，思想是一路。柏拉图对话集里面最主要的一篇《巴门尼德》记下了苏格拉底与芝诺的一段对话。苏氏问他：你的一切论述，是否都是为了证明存在是“一”，“多”并不存在，和你的老师一样呢？芝诺说：不错，你正确地了解了我的总目标。苏氏进一步说：你与你的老师，一个说只有“一”，一个说没有“多”，其实是一个意思，却使人们以为你们说出了不同的话，用这种办法欺骗大家。芝诺称苏氏机灵得和斯巴达的猎犬一样，善于追寻迹象。但他特意地说，他与他的老师并非如苏氏以为的那样，是做出一种做作的行为。他的老师从肯定的一面说出只有“一”，但为一些人取笑，他便从反面来假设如果存在“多”，看来要比假定“一”存在更加可笑。

从柏氏的这一段记录当中可以看到，连柏氏和苏格拉底这样思想深刻的大家，对于巴门尼德和芝诺这一对师弟子的与众不同的想法，也是不能够体贴。巴氏这一对师弟子的只有一、没有多；只有止、没有动的这些看上去奇怪的想法，其实哪里是在要大家说出它们错在什么地方，而是要大家想一想它们似乎明显地让人觉得是错的地方到底有哪些倒可以说是对的。

芝诺似乎在人类这样的早期，就已经有点看出人类的知识力的方向只是在向分析的一路走去，想把天下万物拆解开来掌握在手里，也便是那个“多”字。而且人类的这一条分析的路有一点不归路的味道，一旦走开步，便会越走越远。芝诺的飞毛腿赶不上乌龟、飞矢不动以及走不完的一段有限路途等有名的几个悖论，便都是针对着人类走向分析的这个“多”的路向而发的。飞矢的动态如果从多的一面来分析，可无限地分割下去，便成了无限的静的空间，哪里还能动得了。飞毛腿去赶那乌龟，可无限地分割，便是无限地接近，但哪一点才是重合的一点呢？人类好像在这个多的路向上是找不到的。

在如今残存下来的一个芝诺论自然的残篇里，他说了一段话：同一存在物如果是多，必有各个部分，那么部分的边界必有大小，并与其他部分有联系，有大小、有联系的边界，那便不是真正最外面的边界，边界之外还有边界，那便“大会大到无穷”。同时又“小会小到没有”，因为我们一般设想的可以划分部分的分界，是既无大小又无厚度和体积的东西，这种东西实际是没有的，所以他说小会小到没有。这个话实在的意思，便是我们如何能够把天下万物分成多的部分呢？

说到运动，那个残篇里还说，（如果我们要把运动从多的里面来分析，那么）运动的东西既不在它所在的地方运动，又不在它所不在的地方运动。这或者即是后世德哲康德氏所谓“二律背反”者也，亦即人类理性之穷尽及穷途处，虽然黑格尔氏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里说及芝诺的地方，把芝诺的这句话借过来说，其实运动即是在此又不在此的辩证法。

然而实在说来，如果要认辩证法的祖师，或许还应该算是芝诺，黑格尔氏在这一点上却不过好像是更为“聪明”一些而已。对人类有益的辩证法，总还是在于止其所不得不止，而不是所谓“放诸四海而皆准”式的普适也。如今人类在那个所谓多的分析的路上已经有点迷途难以知返，在一片“微而又微、玄之又玄”的迷津烟雾之中，薛定谔、波普尔等近代大师身上的那种视一切不过是可证伪的假说的怀疑精神，慢慢地变得稀薄无可踪影，这时候便尤其会想到古希腊的芝诺，想到他的阿基里斯与乌龟。

再谈湖上生花笔

陈福康

提起湖笔，我怀有一种无比亲切的感情。可以说，湖笔是我的生命之本，没有湖笔也就没有我。因为，我是湖州人，祖上都是做笔的，先母是水盆工，先父则是择笔工。我是父母从事湖笔生产的微薄收入养大的。

记得那年我去东瀛访学，作完学术讲演后日本人请吃饭，欢声笑语，觥筹交错。有朋友提起中国湖笔比日产毛笔好用，我就自豪地说，我父母就是湖笔工人，我故乡就是湖笔的发源地，一位日本朋友发问：“那陈先生您怎么生在上海呢？”我沉默了，然后决定还是告诉他们：“善琏，中国江南湖州一个美丽安宁的水乡小镇，那里自古家家户户都做毛笔。可是那一年，日本侵略军打到了那里，烧杀抢掠，我家祖屋也被焚，我父母历经苦难，徒步逃到上海……”于是举桌无语多时，那位朋友轻声说：“对不起……”

那个日本人比我年轻，当然没有侵华罪责。而且，其祖辈在彼邦的文化母国犯下过罄竹难书的罪行，也绝不是“对不起”三字就能超脱的。

我父母乱世逃难到沪，后在贫民区草草成家，相依为命。母亲继续在家为在沪同乡的制作坊做外包水盆工，父亲陈宏江则经人介绍进上海周虎臣笔庄当学徒。那时日子难过，我的兄姐都不幸夭折。伯父（姑夫）虞宏海则逃难到苏州，也与姑母继续做笔为生。父亲和伯父咋不同姓？这就得解释几句了。我祖父姓虞，陈是祖母姓，父亲童年不幸失怙，寡祖母千辛万苦才把父亲和姑妈拉扯大。祖母就把心爱的独子改成自己的姓，而姑父是我们家的“招女婿”，他倒姓了虞。

毛笔，创作了辉煌的文化。但当年的制笔工却没有多少机会学文化。祖母含辛茹苦，总算硬是让父亲读了两年初小，而我母亲则从来没进过学校的门。父亲写得一手不错的毛笔字，那是因为他从小用自家做的笔在废纸上练字。而母亲，还是解放初政府搞扫盲运动时，在街道组织的学习班上，才识得了一些字。

父亲和伯父虽然都没什么文化，但解放后都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父亲成为上海笔墨庄（分分合合，名称改过多次）的公方经理，伯父也成为苏州湖笔厂厂长。兄弟俩在全国毛笔行业里都有点小名气。当年有很多著名书画家和学者，都很尊重我父亲和伯父。因为他俩不仅手艺好，而且热心地为书画家和学者选笔，还经常业余帮他们修笔，甚至根据需要为他们特制专用笔。郭沫若先生就曾为伯父书写过一首诗，歌颂湖笔工人的创造和贡献。我父亲也收到过不少名家赠送的书画篆刻作品。当年我如想学习书画，父亲说过，可以帮我介绍名家做老师。可惜我年轻不懂事，竟然没有这种积极性。作为笔工之子，我不仅没有继承父母的手艺，而且从来没有好好练过毛笔字，没有正经临过帖。不过因为父亲的关系，我总算和书画有点缘分，如今留在我手头的，还有著名书法篆刻家单晓天、韩天衡先生为我刻的章，和周慧珺女史为我写的条幅等，都是父亲帮我求来的。

回想我小时候，曾多次去父亲做工的笔庄作坊玩，闻笔庄特有的那种气味（好像有樟脑，大概是防止毛料生蛀用的；还有松香，大概是将笔头粘上笔杆用的），看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做笔。有几次父亲晚上值班，我就睡在二楼作坊的桌椅上过夜。一天晚上，我看到桌上做好的笔很多，就拿了一支玩，第二天许振声伯伯（父亲最好的朋友）上班就来问我了。原来那是他做的笔，做了多少支他心里都有数。我交还后，他也没说我什么。这是我现在还记得的一件事情。我长大后，特别是父亲退休后，不知为什么，就几乎不去父亲的工作单位了，即使路过也不进去。大概因为自己平时也不写毛笔，而那里的人又都认识我，好像有点难为情似的。近年，我路过时曾进去看了一下，已经不必担心有什么人认识我了，因为连父亲的最年轻的徒弟也早已退休。我闻着曾经十分熟悉的笔店特有的气味，很想再到楼上作坊去看看，但听说楼上早就不是作坊了（大概现在店里的笔都是从善琏等地批发来的）。店面生意好像也不那么兴隆，有点冷冷清清的。我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惆怅。不过，就在同一条马路上，办了一个“上海笔墨博物馆”，免费开放，倒颇有人去参观。另外，我知道故乡善琏也创办了一个“湖笔博物馆”；江西进贤（也是一个毛笔生产基地）也有“毛笔文化博物馆”。这些消息，如果先父母地下有知，一定会很欣慰。

在父母和伯父生前，我只做过一件与湖笔有关的使他们很高兴的事情。那就是1980年我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湖上生花笔——郭老为湖笔工人写的一首诗》，首次介绍了郭沫若写给伯父的那首诗，并附印了郭老的手迹。父母逝世后，我怀着感恩的心情，整理标点了清乾嘉时钱唐（今杭州）学者梁同书编著的《笔史》，发表于江西进贤的农耕笔庄编印的民间刊物《文笔》上，也算是我学习、研究毛笔史的一个小小工作。

说起江西进贤，原来父亲工作了一辈子的笔庄的创始人周虎臣（清康熙时人），就是进贤人。后来，我还欣喜地看到一份进贤县的文艺刊物《青岚湖》上的一篇文章《周虎臣及周虎臣笔庄》，其中写到解放前上海周虎臣笔庄的笔工都是湖州善琏人，并举了我父亲和许振声等六个“善琏名笔工”的名字，说他们“都是周虎臣上世纪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台柱’，如今他们的徒弟也都成了江浙制笔行业名师”。在千里外的江西的一本小刊物上，居然会出现父亲和伯伯们（我都认识的）的名字！他们都是一辈子辛辛苦苦做笔的最普通的工人啊。

写到这里，又想到近十年前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我对其中介绍毛笔的一节尤为喜欢。当我看到开幕式屏幕上一闪而过的“注面”工序（即把毛笔笔头装嵌入笔杆）时——镜头虽然大概还不到一秒钟，我的眼泪却霎时流了出来！因为，这道工序是我幼小时在父亲干活的作坊里反复看到过的。这个麻利的动作，先父一辈子不知道做过多少次！“水盆”“择笔”这两个词，是我从小就听熟的；“注面”这个专有名词我以前并不知道，是后来在网上查的，还不知道我们故乡善琏是不是这样叫呢。看到奥运会开幕式“注面”这个镜头时，我心里就想，可惜我淳朴、慈爱的双亲都没能看到……

在我父母和伯父母的孩子中，也就只有我一个算是“舞文弄墨”吃文字饭的。长辈们都曾希望我能为湖笔多写点什么。我已经出过十几部书了，但作为笔工之子，觉得真的对不起他们，没有更多地写写湖笔。

笔会

『文汇笔会』微信二维码